

理论(一)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

● 蒋 风 主 编

● 希 望 出 版 社

冰心题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

理论（一）



● 蒋风 主编
希望出版社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一

蒋 风 主 编

*

希望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1.875 字数: 800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 册

*

ISBN 7-5379-0345-X
I·37 定 价: 16.00元

顾问：

叶圣陶

冰 心

高士其

严文井

陈伯吹

叶君健

金 近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叶至善

叶永烈

孙敬修

任大霖

任德耀

束沛德

张秋怀

洪汛涛

浦漫汀

梁 骏

蒋 风

樊发稼

编选者：

方卫平

章 轲

出版说明

一、中国儿童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五四”至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基本上反映了各个时期少年儿童丰富多彩的生活，起到了培养教育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作用。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套系统的资料，足以反映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趋势。鉴于此，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国儿童文学大系》，仅供广大儿童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学习参考。

二、《大系》采用分类编年体例。

三、《大系》共分七卷：理论、小说、童话、散文、诗歌、儿童剧、科学文艺。每卷按篇幅可分为若干册，每册50万字左右。

四、《大系》的编排以首次发表时间或所据版本的时间为序。注释一律采用原著版本。

五、《大系》采用顾问、编委指导下的主编负责制。各卷导言均由本卷主编负责撰写。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

1988年7月

导 言

蒋 风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应该说中国的儿童文学也是源远流长的。早在远古时代，就在人民的口头上产生了神话、传说、歌谣，以后由此演变发展，又有寓言、童话、动物故事，还有在养育儿女过程中诞生的童谣儿歌等等口头创作，其中大多可以看作口头型式的儿童文学，并且作为哺育一代代儿童成长的精神食粮而世代传承。当然，作为文学的一种独立分支的儿童文学，只能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那生产力十分低下的社会发展阶段，人类还处在忙于解决温饱以求生存的严峻时期，儿童常常被人们忽视，没有被看作人生的重要阶段而给予精神上、文化上应有的重视，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尚未“发现”儿童，因此儿童对文学的特殊需要也就被社会所遗忘，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独立分支形态的儿童文学。

在西方，伴随着产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出现了启蒙思潮。启蒙运动者在关注自然科学、哲学、文学发展的同时，十分重视教育，尤其重视儿童教育。这时，儿童才被社会“发现”。在“发现”儿童的同时，人们也“发现”了儿童对文学精神上的需求，“发现”了文学对教育儿童的意义和作用。这才为作为文学的独立分支的儿童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从此，人们开始自觉地为孩子们创作，为少年儿童所喜闻乐见，又对他们有认识、教育、审美意义的儿童文学

作品相继问世。

在我国，由于长达二千余年的封建主义统治窒息了生产力发展，儿童的社会地位和精神上的需求，长期被人们所漠视，塞给孩子们的书，是一些板起面孔说教的东西，或是一些枯燥乏味的识字读本，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童蒙须知》、《圣谕广训》、《增广贤文》之类。这些读物不仅文字艰深，且少文学性。较之西方，中国儿童文学起步更晚，正象人们所普遍承认的那样，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在中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在世界进步资产阶级的科学、民主思潮冲击下萌芽成长的。在此之前，除民间的口头文学外，几乎没有书面的真正的儿童文学。

任何理论的形成都离不开现实为它提供必要的对象或材料。文学理论是各种文学现象的系统概括。“五四”以前，既然基本上没有中国人为孩子们创作的书面儿童文学，当然也就无从产生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所以，可以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也是伴随着“五四”时期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自觉而萌芽出土的。

“五四”以前的中国，当然也出现过一些关于儿童文学的零碎的、经验式的论述，但尚未作系统的科学的概括。那些零星的言论，或可算作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的史前期。

从“五四”到今天，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走过了七十年的历程，还不到一个世纪的历史，因此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术领域。在这块处女地上耕耘过的园丁，人数也是寥寥可数的。

今天，我们回顾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下列几个时期：

- 一、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史前期（“五四”以前）
- 二、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探索期（“五四”时期）

三、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交织期（“左联”时期至新中国建立）

四、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期（建国后至十年动乱前）

五、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灾难期（十年动乱期间）

六、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建期（从拨乱反正到今天）

让我们沿着这条时间的线索作一番简略的回顾吧！

—

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千六百多年前的《诗经》。这部熠熠发光的中国古籍中就有一些诗论述了作诗的目的、诗的社会功能等，这可说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萌芽。一千四百多年前问世的《文心雕龙》已是一部系统化了的文学理论巨著。此后诞生的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就有不少文论、诗论，可是却找不出一篇儿童文学论文。这当然是由于自觉地为适应儿童欣赏需要而创作的文学尚未出现，因此儿童文学理论缺少研究的对象，也就缺乏它萌芽的土壤。

从现有的资料看，明代吕德胜的《小儿语序》和吕坤的《书小儿语后》，这两篇写于四百多年前的谈论儿歌童谣的短文，可算是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滥觞。它简要地论述了儿歌童谣的特点及其对儿童教育的重要性，还介绍了他们父子俩搜集、改编、创作儿歌童谣的体会。这些言论虽然还显得十分简陋，但从历史的眼光看，它确实对传统的儿歌童谣作了初步的概括。

第一，它论述了儿歌童谣的本质及其特征。吕德胜认为“儿之有知而能言也，皆有歌谣以遂其乐”。突破了古代儿歌童谣的“荧惑星”说的迷信观点，抹去了唯心主义的迷信色彩，从儿童

本位出发点明儿童有借“歌谣以遂其乐”的特点，作为儿童的一种自娱的文学样式，“群相习，代相传”，在儿童口头上口口相授，世代传承，广为传播，但“不知作者所自”。言简意赅地总结了民间儿歌童谣的口头性、传承性、匿名性等特点。

第二，肯定了儿歌童谣的艺术力量和教育作用。吕德胜指出儿歌童谣有“童子乐闻而易晓”的特点，看到它“欢呼戏笑之间”，可以寄寓“理义身心之学”的作用，而且“一儿习之可为诸儿流布；童时习之，可以终身体认”，因此，他认为只要达到“蒙以养正”的目的，就不必害怕鄙俚之讥，用来张扬“立身要务”的教育传播的工具。

第三，总结了创作、改编儿歌童谣的体会。吕坤在继承他父亲的关于儿歌童谣理论基础上，进行了儿歌童谣的辑录、改编工作，并写了《书小儿语后》，总结了他自己从事这项工作的体会。他认为搜集改编以至创作儿歌童谣，语言要浅显通俗，因为“言各有体，为诸生家言，则患其不文，为儿曹家言，则患其不俗”。力求明白如话，儿童才会“鼓掌跃诵之”，做到“虽妇人女子亦乐闻而笑，最多感发”。因此，他主张用“极浅，极明，极俚，极俗”的语言去改编儿童歌谣，让孩子们“入耳悦心，欢然警悟”。（吕坤：《去伪斋文集》内附刻的《“宗约歌”引》）。

吕德胜、吕坤父子对我国儿歌童谣的研究作了初步的理论概括，尽管尚存在粗浅、片面的缺点，但在轻视儿童、轻视民间文学的封建时代，吕氏父子的这些言论还是具有某些历史价值的。

可惜，我国封建文化积习太深，儿童没有社会地位，因此此后的四百年中，似乎不再有人关心到儿童的文学需要。这固然与那漫长的封建统治时代里，儿童没有独立的人格有关，也跟当时缺少研究对象有关。

直到十九世纪末的晚清时代，随着绵延数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受到激烈的冲击，中国民族意识中的封建根基开始瓦解，民主、

科学思潮席卷神州大地，无视儿童社会地位的儿童观逐渐解冻。这时有人关心到儿童，为孩子们移译一些适合儿童阅读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出版，受到小读者的欢迎。于是中国近代一些知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如梁起超、黄遵宪、林纾、徐念慈、周桂笙、孙毓修、李叔同等人，从“开发民智”要从儿童始的观点，站出来为孩子们呼吁，希望全社会都关心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读物问题，这样，儿童文学的某些理论课题也开始为一些有识之士所论及。

从晚清到“五四”时期可说是我国儿童文学的觉醒期。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内容仍比较粗浅简陋，尚未形成较系统的儿童文学理论形态。

早在戊戌政变以前，康有为、梁起超等人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出发，热情呼唤“少年中国”，期待“如乳虎”的民族的新生，把提倡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作为改良主义运动的一个方面。梁起超在《饮冰室诗话》、《译印政治小说序》等论著中，论述了儿童诗歌、儿童小说、儿童戏剧、儿童音乐等儿童文艺样式的特点和作用。他特别强调小说的神奇作用：“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亲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把小说看作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而今日的少年，来日的主人翁，为了实现他“新民”的主张，把小说看成童孺的必要精神食粮。梁起超从“小说乃国民之魂”的观点，第一个从理论上阐述了小说对儿童的重大意义和作用。这为他整个改良运动中重视并倡导儿童文学奠定了最初的理论根据。

1908年，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署名东海觉我，刊于《小说林》九、十期）中强调宜写出一种“足备学生之观摩”的儿童小说，“其旨趣则取积极的，毋取消极的，以足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为主”，并对这种小说的

形式、开本、体裁、文字、篇幅、插图、价格等方面，都作了具体的简要的论述，进一步为儿童小说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倡导儿童文学的先驱者中还有一位值得我们注目的人物，就是先于1901年创办《杭州白话报》，后又于1903年在上海创办《中国白话报》的林獬（又名宣樊子）。这两家报刊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初期的重要宣传阵地之一，都相当重视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常发表儿童文学的作品和论文。早在1902年《杭州白话报》就提出“少年乃为国之宝，儿童教育休草草”的重视儿童教育的观点，指出“儿童譬如花木，儿童智识初开的时候，就譬如花木萌芽初发的时候，花儿匠栽培花木，就譬如训蒙师教导儿童”。因此倡导“教育最好把些爱国的故事，为人的箴言，替儿童演说，就可以养成儿童爱国心，陶铸儿童天良性。”在《中国白话报》创刊辞中，署名白话道人的林獬更申明要专为儿童开辟“歌谣”专栏，提供“各种好说的歌谣教孩子们唱唱，也着实可以长进他们的识见，畅快他们的性情。”并于第三期起连载了他自己的论文《小孩子的教育》，强调要用文学这一特殊手段，对儿童进行陶冶和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一打响，民主思潮汹涌澎湃，进一步推进了对儿童读物和儿童文学的倡导，知识界从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的密切关系着眼，热烈讨论了儿童读物问题。例如斋厂在《中国教育上固有之特色及今后教育之要点》（刊1914年16期《中华教育界》）一文中说：“文学所以和人性，使之悦乐，博其兴趣，而发其美感，亦改造精神之要术也，文明国之教育，莫不重文学者，故诗歌、小说，列于诵习，夫文学犹有诱导社会进化之功焉。”这一段话，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的关系。

限于篇幅，所以仅能列举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言论，借以说明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在“五四”以前，已有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作了一些探索，对近代儿童文学建

设提出过一些具有理论色彩的见解，虽未能成气候，更未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但却为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系统建设，做了一些铺路的工作。

二

以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为中心，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阶段，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五四”时期。这一历史时期，不仅在我国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也是我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里程碑。

“五四”前后，世界进步思潮给当时封闭式的中国社会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大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道德、文学观念的变革，一大批接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迎着时代黎明的曙光，敲响了时代的晨钟，高举着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发起猛烈的进攻，从而掀起了现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这股狂飙突进的新思潮激荡下，与思想解放和个性觉醒的时代呼声相应答，长期被社会忽视的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儿童教育问题、儿童文学问题一起受到社会的关注，被人们提上议事日程。

《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主编一开始就积极鼓吹民主政治，提倡人权，倡导建立中国民族自己的新文化。1918年1月，刊物刊登征求有关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文章的启事中，特别指明包括儿童文学。同年5月又刊登了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第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救救孩子！当时《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等也擂鼓助阵，围绕着妇女和儿童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时代的先驱者的心目中，儿童是将来的“人”的萌芽，他们应该有合理的、幸福的新生活，他们的天性，应该得到自然的发展，他们的存在，理应受到

社会的关心和尊重。随着社会儿童观的转变,儿童的被“发现”,儿童文学在中国开始得到公开提倡,于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前奏曲吹响了,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翻译、改写、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争相问世,作为提倡儿童文学和回答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中发现问题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也就进入一个新的探索时期。

在这一探索者的行列中,最早并较全面地探讨研究儿童文学理论的,要算周作人了。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已开始接触并关心儿童文学。1911年秋,他从日本回国在故乡任教时,曾热心地收集儿歌、童话,在鲁迅的关怀支持下,潜心地研究儿歌、童话。第二年写成《童话研究》和《童话略论》两篇论文,在绍兴《民兴日报》发表,成为我国儿童文学史上最早发表的两篇童话论文。1914年又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发表了《儿歌之研究》和《古童话释义》。周作人发表于“五四”之前的这四篇儿童文学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是,由于当年儿童文学还被轻视,周作人开始投稿受到冷遇,使他在此后六七年对儿童文学一直持沉默态度。直到“五四”以后,他在时代思潮影响下,才又活跃起来,先后发表了有关儿童文学论文计二十余篇,较全面系统地探索了儿童文学的性质、特征、作用、插图、创作方法等基本理论,又对童话、寓言、儿歌、童谣、儿童剧、儿童科学文艺等主要儿童文学体裁作了研究,取得了我国儿童文学研究史上第一批较系统的成果。过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国后将他在儿童文学理论上的建树一笔抹掉了。今天回顾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史的发展时,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重新估价他对我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贡献。

首先,他从反封建思想出发,竭力鼓吹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他认为“中国向来对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指出“儿童在生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内外两面的生活”,批判旧的儿童观,提倡新的儿童观。

其次，他从儿童的精神需要出发，第一个提出“儿童的文学”的命题，并且充分肯定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

第三，从理解儿童的世界出发，他较早地提出“儿童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主张，连同他以此为立论根据的一系列论文，为我国草创时期的儿童文学理论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第四，较全面地探索了儿童文学的各种样式，为我国初期的儿童文学体裁论放置了第一块基石。

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不无片面的观点和消极的因素，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但是我们评价他对我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贡献时，就不能不看到他确实是我国儿童文学史上最早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为我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一历史功绩还是不应抹煞的。

提到周作人，不能不顺便提到胡适。在提倡新文学的文化运动中，胡适是个头面人物。虽未见他写过关于儿童文学的论著，目前只看到赵景深从《晨报》辑录的一段论述：《儿童文学的价值》（见赵编的《童话评论》）文字不长，但由于他是“五四”运动中引人注目的人物，影响还是不可小视的。胡适第一个在中国传播杜威的学说，因此他的儿童文学观也是建立在儿童本位论的基础上的，与周作人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童话神话，当然是他们（指儿童——引者注）独有的恩物；各种故事，也在他们欢喜之列。他们既欢喜了，有兴趣了，能够看的，不妨尽收罗这些东西给他们，尽听他们自己去看，用不着教师来教。”

在周作人、胡适的大力倡导下，建立在儿童中心主义的基础上的儿童本位观的儿童文学理论，就成了我国儿童文学研究探索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理论，左右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界达三十余年，其影响之深，播及之广，可从始于“五四”的一些儿童文学论著中找到见证。如魏寿镛、周侯予编的《儿童文学概论》（1923，

商务版)中说:“儿童文学,就是用儿童本位组成的文学,由儿童的感官,可以直接诉予他精神堂奥的。”又如朱鼎之著的《儿童文学概论》(1924,中华版)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儿童文学,是建筑在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基础上的一种文学,以适应儿童的自然的需要,……本来儿童文学,是由儿童的感官可以直溯于其精神堂奥的,拿来表示准依儿童心理所生之创造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当年许多知名作家的儿童观和他们提倡儿童文学的主论根据,如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郭沫若的《儿童文学之管见》(1922),叶圣陶的《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1922)等,也无不是从儿童本位出发的,直到三十年代朱经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中解释儿童文学时仍然如此说:“以儿童为本位所组成之文学,谓之儿童文学。”

翻阅“五四”以后直至建国前的儿童文学研究论著,几乎都逃不脱周作人所宣扬的“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尽管他们的理论是从西洋移植而来,论点也不无偏颇之处,但由于先驱者的不断努力,为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起了拓荒的作用。特别应提一下的是上述两本《儿童文学概论》,还有周侯予在中华出版的《儿童文学概论》(1923)及张圣瑜在商务出版的《儿童文学研究》(1928),基本上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框架,标志着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学科的建立。

在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理论园地上奋力开拓的,除上述提到者外,还有郑振铎、夏丏尊、胡愈之、严既澄、诸东郊、周邦道、赵景深等人,他们探索的领域,几乎涉及到儿童文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包括儿童文学的地位、作用、性质、功能、特征、作家、作品、教学、批评、阅读、欣赏、传统、遗产等,都进入探索者的视野。他们的辛勤的劳动成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整体建设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所有这些努力,使儿童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

在这一时期得到确立。

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从资本主义世界开始的经济危机波及全球，当然也影响到已沦为帝国主义国家所瓜分的，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境遇的中国。“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社会的现实，毕竟是严酷的，并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破除了旧的成法，就会出现好的政府、好的社会。于是有识之士，忧国忧民，上下求索，探寻出路。因此各种思潮纷呈，实验主义、罗素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如胡适当时就发表了《实验主义》、《不朽》等文章，把实用主义当作改良社会主义新思潮，介绍给寻找新路的青年。而面对纷呈的社会新思潮，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把眼光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这一现实反映到儿童文学理论领域，就形成一个各种思潮交汇，而以儿童本位论的儿童文学观和阶级论的儿童文学观两大思潮为主的交织期。

1930年，在白色恐怖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参加左联的作家都自觉要求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其中主将就是左翼文坛的旗手鲁迅。

鲁迅这一时期完成了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思想转变，他把少年儿童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并且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年青一代身上。他一方面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精神，批判了当时儿童文学领域内一些不良倾向和荒谬的看法，反对把陈旧的、粗制滥造的、不堪入目的所谓儿童读物塞给孩子们，更以大无畏精神痛击了统治阶级御用文人用封建的、

买办的、法西斯思想毒害孩子们。另一方面，他又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态度，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细致而又具体的建设性精辟意见，包括对儿童文学的任务、年龄心理特点、题材、语言、装帧插图，对各种儿童文学体裁，对儿童读物的创作和阅读，对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评论和介绍等，为我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见解。

茅盾在这一时期也写了一系列儿童文学论文，包括《给他们看什么好呢》、《孩子们要求新鲜》、《怎样养成儿童的发表能力》、《论儿童读物》、《关于“儿童文学”》、《书报评述·几本儿童杂志》、《再谈儿童文学》、《不要你哄》、《我们对儿童给了些什么》、《从〈有眼与无眼〉说起》、《〈团的儿子〉译后记》、《儿童文学在苏联》、《儿童诗人马尔夏克》、《马尔夏克谈儿童文学》等，他也跟鲁迅一样，一方面为维护儿童文学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另一方面总结了我国儿童文学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提出了建设新型儿童文学的设想，系统地阐述了进步儿童文学观，包括儿童文学的方向、任务、功能、特点、题材、形式等，对我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从三十年代开始，苏联的儿童文学理论开始译介进来，如高尔基的《主题论》等，不仅对我国当时的儿童文学创作有着指导意义，同时还对此后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茅盾的《论儿童读物》一文就与高尔基的《论主题》一文某些观点有相似之处。

由鲁迅、茅盾所开创，并在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直接间接影响下，初步形成了我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强调儿童文学的社会主义教育方向性和儿童审美心理的年龄特征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一直被延续和扩展到建国后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

这一阶级论为基础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在中国初步形成并在儿童文学领域传播，冲破了早在“五四”时期就已主宰中国儿童